

东北学

现代文学研究丛书

刘中树 / 主编

吉林人民出版社

■ 孙中田 逢增玉
■ 黄万华 刘爱华 著

东北沦陷区文学史纲

Liao Kao Xia De Miu Si
镜铐下的缪斯

DONG BEI XUE RENXIAN DAI WEN XUE YAN JIU CONG SHU

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九五”规划项目

●负责人 孙中田

◎刘中树 / 主编

◆东北学人现代文学研究丛书◆

镣铐下的缪斯

——东北沦陷区文学史纲

◎孙中田 逢增玉 黄万华 刘爱华 著

吉林大学出版社

东北学人现代文学研究丛书

镣铐下的缪斯

——东北沦陷区文学史纲

孙中田 逢增玉
黄万华 刘爱华 著

责任编辑、责任校对：黄曼萍

封面设计：张沐沉

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解放大路 125 号)

吉林大学出版社发行
长春市永昌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1999 年 11 月第 1 版

印张：8.25 插页：4

199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04 千字

印数：1 - 1000 册

ISBN 7 - 5601 - 2311 - 2/1·111

定价：13.00 元

总 序

刘中树

文化发展与地理位置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关系，这似乎可以叫做地缘文化学。这不是突发奇想，而是人们在长期的学术研究和工作中的深切体验。

相对于内地中心城市，特别是京沪等地，东北无疑属于边远之地，文化的积累较薄，既无中原的厚重，又无江南的活跃。因此，多少年来东北文化、文学和学术始终未能解决自身定位的根本问题，而这又是一个被忽略、被淡化了的问题。

有人以为，无论文学创作还是学术研究，都要突出地方的特色。就现代文学而言，就应该立足本地，研究东北的作家作品。这种思考无疑是有重要意义的，而且切合实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东北曾出现过许多著名的作家诗人，而且直到今天仍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有的甚至被冷落或忽视。像吉林省的骆宾基、李辉英，特别是两位名噪一时的女作家梅娘、英娘。但是，作为一个现代学者，不仅要立足本地，更要面向全国和世界。这不仅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权利，当代文化使每个人都享有这种权利。对于人类和民族普遍性课题的研究不属于哪一地域和哪一人群的特定专利。这一观点的提出，是基于中华文化与东北文化历史关系的思考。

东北历来被视为蛮荒之地，由于清兵入关和“九一八”事

变，东北才因突发性的政治事件而被人关注。于是才有了满清史志，有了“东北作家群”。然而一提到东北文化，在过去人们心目中呈现的还只是“棒打獐子瓢舀鱼”的未开化形态。“罪臣”的流放和关内移民的进入，东北文化才出现了不小的繁盛景象，亦只不过被认为是单纯的中华文明的流转、辐射，不具有区域文化的特质。本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东北地区古人类化石（如金牛山人化石、安图人化石）的发现，证明28万年以前东北大地就有人类在这里生息、繁衍。特别是1983年辽宁红山文化遗址的发现，进一步证明在5000年以前，东北文化就是与中原文化同时并存、共属于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过去人们关于东北文化单纯移植性的认识。至少，东北文化的本源性和移植性开始成为东北文化共同的构成条件。由此，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东北文化作为与中原文化同时并存的区域文化，既有华夏大文化系统乃至人类远古文明的共同属性，而且又因历史和地域的特殊原因，又形成了独特的内涵与素质。也就是说，东北文化构成的自在性也存在于接受性之中。正是在这一认识上，形成了我们关于东北文化、文学和学术价值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思考。

以上是我们思考的第一个层面。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深入一步表现出对整个人类和中国文化的关注，即对人类和民族的共同问题发出自己的看法，而这恰是作为一个当代学者应具有的时代素质。文化的特殊性是一种文化区别于另外一种文化的根本标志，不同文化构成了人类文化的共同体。东北文化的特殊性使其在中华文化的大系统中占据了特别的位置，而对这一特殊性的发掘亦是强化东北文化地位的重要方式。但是，对于这一特殊性的强调必须以中华文化和人类文化的普遍性为前提。而在此基础上，对人类和中国共同问题的关注，也是对文化的普遍性和同一性的承认。作为东北现代文学界的同仁，我们一方面要义不容辞承担起对东北现代文学的整理和研究，另

一方面，我们又必须与国内学术界同步，从时代的高度对有关问题发出自己的声音，无论这种声音是高是低。

多年来，东北学人在一种不十分有利的文化历史和地理环境中，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进行了踏实而富有特色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令国内乃至海外学界瞩目的成果，并且出现了一批有影响的学者。他们不仅立足于本地，以其不可替代的文化和地理优势深入进行有关东北现代文学的研究，而且时刻关注国内外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状态，站在时代和学术的前沿，不断发出自己的声音，拿出新的研究成果，这套丛书就是各位作者在此意义上所弹奏出的新的旋律。

丛书的作者中有老一代卓有成就的著名学者，也有在学术界崭露头角的中青年学者，这套丛书是他们近年来最新研究的心得。

目 录

引论：苦难的时代 苦涩的文学	1
东北沦陷区文学与母体的渊源	1
局部与整体间的互补与双向交流	7
它是战斗的，也给人以愉快和领悟	12
“文丛”派、“文选”派与“乡土文学”	16
文学团体、流派的衍化与发展	16
“文丛”派与“文选”派	21
山丁的乡土情结	26
王秋萤的时代风情	46
袁犀的才智与奋进精神	50
女性作家群体的小说	58
社会角色与民族关怀	58
无法忘却的女性记忆	66
雄健沉郁的艺术风格	73
梅娘的悲天悯人之怀与冲突着的两性世界	78
描写“老中国的儿女”的吴瑛和多才的但娣	91
艺文志派文学的风貌	102
“写印主义”的倡导	103
多元的艺术探索	112
古丁创作的“独步”哲学	126
“鬼才”爵青的悲哀	145

追求“纯美”的小松·····	160
东北的乡土短篇能手疑迟·····	172
东北作家群的艺术取向·····	183
灾变中的愤然崛起·····	183
“反日救亡”的文学母题与审美格调·····	192
历史凝视中的白山黑水魂·····	207
东北作家创作的历史文化意蕴·····	210
后 记·····	254

引论

苦难的时代 苦涩的文学

东北沦陷区文学与母体的渊源

人们对黑格尔这样的命题曾多所引证：“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恩格斯剥开它虚假的外壳说：这“显然是把现存的一切神圣化，是在哲学上替专制制度、替警察国家、替王室司法、替书报检查制度祝福。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是这样的，他的臣民也是这样想的。但是，在黑格尔看来，凡是现存的决非无条件的也是现实的。在他看来，现实的属性，仅仅属于那同时是必然的东西”^①。是的，在文学的历史解读中剥开“现存”的迷雾，寻求合理的必然的东西，该是多么艰难而又意味的事。对于东北沦陷区的文学研究来说，尤其显得切要。杂多的文化景观，被扭曲的现象，都曾取得过“现存”的外衣，可谓真伪杂糅，善恶浑呈，美丑难辨。然而，它的合理性如何，能否成为必然的东西，却自有依归。一个时期，人们曾为它的“敌伪”疑团所却步，止于可与否的价值判断中，而难于去浊澄清，沙里淘金，这不能不说是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一大损失。然而，历史虽然时时沉默着，却是一个不变的常数，当解读者在一定的文化氛围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0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

中，形成科学而又真诚的对话态势，才会看清它的合理属性。目前，对东北沦陷区文学的研究，正面临这样的势头。实际上，这也正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拓宽领域，正本清源，深化自身框架的必然结果。因为台湾文学、上海孤岛文学、东北沦陷区文学，无论怎样纷纭复杂，扭曲变形，终究是它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对于东北沦陷区文学的研究，不仅为关东的一些研究者所关注，同时也是整个现代文学研究界的重要话题，乃至台湾、海外也多有研究者付出劳动。

这项工程的第一步工作便是披沙觅金，寻索庐山真面。诚如前苏联科学院院士依·波·巴甫洛夫所说：“事实对于学者就是空气，没有它你就永远腾飞不起来。”真知，是卓识之母。一个研究者为史料所囿，不能在“现存”与合理之中寻取固有的文理，自然难能索取到真知，但是，缺乏史实的查证，没有文献的基石，毕竟是空中楼阁。有时一则消息，一些数字，对于研究者都是可宝贵的。例如，日本侵略者为了在东北推行殖民文化，大肆查禁进步书刊，同时为了征服民心也极力用日伪的思想和文化所取代。据统计：1932年3月至7月共焚毁进步书籍650余万册。1935年至1938年的4年间，禁止发行的报纸7440多份，普通读物500多册。同时向东北输入的日本书刊：1936年为58.7万册；1937年增至380万册；1938年增至1000余万册；1939年增至1440余万册；1940年增至2230余万册；到了1941年高达3440余万册（参看《伪满洲国史》有关章节），这数字本身便具有说服力量。不仅如此，随着日伪军事、政治的强化，文化专制的策略也全面的展开。1937年在伪满国务院总务厅又设立了弘报处，从此对新闻、广播、电影、宣化、编辑、图书情报等一切方面都统辖起来。对于文艺、音乐、美术、电影、图书，施行“一体化”的检查与控制；与此同时，也以各种名目设立奖金，如大东亚文学奖等，拉拢作家和意志薄弱的文化人。在这种态势下，爱国的文

化事业处于异常艰难的境地。

正是如此，人，作为历史的中间物，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合，便处于一种异常复杂的状态；而许多史实在一定的情势下，不仅具有流变性，也时而呈现出模糊状态。从心理学的视角审视，人的性格固然有其稳定的恒常状态，但是仍然是一个杂糅的立体。歌德有时候是伟大的，但有时候又是渺小的；他有时候是反抗的、嘲笑的蔑视世界的天才，有时候又是拘谨的、满足于一切的狭隘的小市民^①。黑格尔像歌德一样，在自己的领域里是真正的奥林帕斯山上的宙斯，然而，恩格斯说，他仍然没有摆脱开德国市侩的习气。鲁迅认为陶渊明固然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一面，同时也有“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金刚怒目”式的一面。在现代作家中，叛徒与隐士以及后来附逆的周作人，也是同一个人。对于在一定政治框架、文化统治夹缝中生活的沦陷区作家来说，更具有复杂的“文化性格”。就社会倾向说，萧军、萧红、金剑啸、李季疯、山丁等作家，大家是比较认同的。古丁就比较复杂一些。这个既受日伪“赏识”，又被严加监视；既以“写印主义”造成论争，又坚持要用“母语写作”；既是“大东亚文学大会”的重要成员，又要在创作中“缩短万民的距离”；要把底层民众的苦难，放在自己的艺术观照之下，就显得复杂得多了。甚至他自己也认为：“在我的精神生活里，已经蓄满各种不纯的混浊物”。这就为研究者提出了更为繁难的命题，要付出勇气和真识，要摆脱是与非、敌与我简单的两极批评模式，去品评作为一个社会关系综合的人，品评作为历史中间物的人，看来，科学之途上，确实难于寻求到平坦而又笔直的路的。同时，作家的言行，和他的作品一样，只能充作研究者的客观材

^① 参看恩格斯：《论歌德》，《马恩列斯论文艺》，第4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料，作为研究的客体而存在，研究者自当入乎其内，更当出乎其外，既要对象化，又要超越对象，从而保持研究者的独立品格。在这个过程中见仁见智的事，是会层出不穷的。人们说，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大抵状出事物纷繁的态势。莎士比亚的创作是有口皆碑的，马克思认为他的创作是世界的艺术顶峰之一。可是，偏偏是艺术大师的列夫·托尔斯泰认为莎剧是“很糟的粗制滥造之作”，这也是事实。对于沦陷区文学见解的抵牾，也许有助于事理的切磋。因此，在繁杂的事实中，寻绎合理的见地，是本书努力的指向之一。

毋庸置疑，苦难的东北沦陷区的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母体的一个子系统；是中国文学历史走向中不可分割的一环。如果把中国文学视为一个大文化圈，那么东北文学则属于地域文化的范围。局部与整体之间，虽属不同空间，但却血肉联结，唇齿相依。这无论从历史的因缘和共时的关系来说，都是如此。过去我们多侧重于中国现代文学整体的研究这无疑是必要的，在历史的梳理中，不但可见整体的面貌，民族文化的传统流脉，同时，也可化出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融通中的现代形态。但是，局部的、地域性文学的研究，也是不可或缺的部分，充实地域文学的研究无疑会丰富、深化整体研究的内蕴。丹纳的《艺术哲学》是一部学理宏深的著作，然而，他的视点却深深地容纳着地域性和民族性的特征。他说：“我想做一个比较，使风俗和时代精神对美学的作用更明显。假定你们从南方向北方出发，可以发觉进到某一带就有某种特殊的种植，特殊的植物。……地域的存在与否，决定某种植物的出现与否。”“自然界有它的气候，气候的变化决定这种那种植物的出现；精神方面也有它的气候，它的变化决定这种艺术的出现”^①。这里，丹纳把自然现象和精神现象混同起来加以类比，自然不

^① 《艺术哲学》，第8—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一定妥当，但是他所注意的地域、时代和民族文化生成中的交互作用，依然是有价值的。就此来说，近一时期，研究者从荆楚文化、齐鲁文化、岭南文化以及东北文化等诸多侧面，论证中华民族的文化与文学，应该说是有价值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意味着现代文学研究的深化。特别是东北现代文学、沦陷区文学，不仅有着特殊的地域风情，也经历过历史的磨难，它和现代文学的母体既有血肉的渊源又包蕴着特殊的际遇，在地域、民族、时代的衍化中，理出它的色彩与特征，对于整体的中国文学研究来说不无重要的意义。

应该说，东北现代文学和沦陷区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母体之间，是在双向交流中，以互补的势头共同发展的。中国现代文学是母体，它呈现着多元一体的态势；各种区域文学，则以千姿百态丰富着它。在东北大地发展的关东文学，从来不是封闭的、狭窄的存在。在它的发展中，始终融贯着母体的血脉，并且保持着直接的联系。在中国现代作家中，胡适、冯至、瞿秋白、王统照、老舍、许玉诺、臧克家、穆旦等，都曾在历史上置身东北，并以东北的生活酿成艺术结晶。胡适于1924年曾应邀来东北，7月30日在大连的青年会馆发表《新文化运动》的讲演。文章后来发表在《青年翼》（1924）上。瞿秋白的《饿乡纪程》中的“蒙昧也人生！/霎时间浮光掠影。/晓凉凉露凝，/初日熹微已如病”的诗句以及“心头的奇异古怪的滋味”，有的就是在“冰雪之区”的东北写成的。王统照的《北国之春》，“虽然不是质直的纪事”却也是“在东北过了一春的光阴，见过不少的各样人物，听过些令人难以想象的事情”^①的记录。1927年，冯至“逆着凛烈的夜风”来到“那大而黑暗的都市”哈尔滨做中学教员，1928年1月写下了组诗《北游》。在《哈尔滨》的诗中，他不仅对“犹太的银行，希腊

^① 《王统照文集》第5卷，第3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的酒馆，日本的浪人，白俄的妓院”，以及“面上总是淫淫的嘻笑”的中国市侩和穿着异样的西装的姨太太等光怪陆离的现象，进行了揭露，同时更深情地抒发了诗人的感受：

我像是游行地狱，
一步比一步深；
我不敢望那欲雨不雨的天空
天空充满了阴沉阴沉……

这些诗凝结着中国现代作家与东北文学的密切因缘，同时也透露出作家对祖国的忧患意识和积极的参与精神。当我们进行地域文学梳理时，只是孤立地进行线性的考察显然是不够的。

不仅如此，如果从间接的影响和接受关系来说，就更为深厚。应该说，在现代文学的发展中，无论内地作家或东北作家，都是在“五四”文化语境中共同成长的。中国内地作家的作品，时时推动着东北文学的发展，影响着关东文学的趋向。就是在敌伪的统治时期，通过严密的封锁，在报刊、杂志上，也时时把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蒋光慈、曹禺等作家的作品介绍过来。以鲁迅为例，他的许多作品，几乎在创作的同时，通过各种渠道在东北流传着。1923年顷，在《盛京时报》上，便转载过鲁迅刚刚发表不久的《不周山》（《补天》）和译著《时光老人》。1929年，在《新民晚报》副刊介绍过《热风》。后来一个署名代生的作者，曾以《今日文学》为题，介绍中国现代作家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作家的业绩。1931年，在《满蒙》月刊上，《阿Q正传》被译成蒙文连载。与此同时，《呐喊》、《彷徨》和商务印书馆的三通小丛中鲁迅的作品，在东北知识青年中也比较广泛的流传着。东北作家山丁曾回忆他在走向文学道路时，就曾通过他的老师阅读着鲁迅的《呐喊》和《彷徨》，从中吸取补养。东北作家李季疯在

他的杂文中，曾不断地引用鲁迅的警句，阐发自己的思想。1936年由田贡等人组成的“L.S（鲁迅）文学社”，便是以鲁迅命名的。他们也努力阐发鲁迅的精神。至于谈到鲁迅对东北青年作家的培育和提携，更是感人至深了。据统计在《鲁迅日记》中记载鲁迅与萧军、萧红的书信往复、来访等事宜就达180余次；《鲁迅书信集》中存留的有关二萧的信件是53封。仅此，便可得见鲁迅与东北作家关系的一斑。鲁迅披阅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和萧红的《生死场》后，并分别写下了序言，更亲自编入“奴隶丛书”使之面世。星移斗转，1976年当鲁迅逝世60周年时，萧军曾以诚挚的情怀这样写着：“40年前此日情，床头哭拜忆形容”。“镂骨恩情一若昔；临渊思训体犹寒”。“等得黄泉拜见日，敢将赤胆奉尊前”。此外，就东北文学自身的发展考察，可以说，时时渗透着整体的现代文学精神。例如，“五四”运动后，马加等人组成的北国社，便与国内进步、革命文学活动保持着联系。他们发表的《文学与时代》、《文学与阶级》等文章，都是与整体的中国现代文学相应合的。当时，在东北颇有影响的“冷雾社”中许多成员便非常推崇闻一多、徐志摩、朱湘、李金发、于庚虞的诗作。在艺术追求上，也自觉地接受这些作家的影响。此外《关外》、《冰花》等杂志，亦大抵如此。《冰花》一问世，便发表了《论国内文坛的转变对东北文学影响》的论文。可见这时东北文学发展的自觉的状态。

局部和整体间的互补与双向交流

自然，中国现代文学的母体与分支、局部与整体之间，它们的发展取向和相互关系是互补的、双向交流的。从整体审视呈现着多元统一的走向；从局部考察则以多向纷呈的势头，充实于母体之中，给予母体以活力。就文化的历史渊源来说，“文”与“化”的文字符号，据《易·系辞下》索解：“物相杂，

故曰文”。文的本义，指的就是各色错杂的纹理。而“化”则意味着变，所谓“万物化生”是也^①。中原文化与地域文化之间，在双向交汇，渗透流变中，才能演化、生成出种种新的质态。所谓化而成之，这是一种必然的趋势。东北沦陷区的文学与整体的现代文学的关系也大体如此。

应该说，东北的文化与文学，在久远的历史发展中，已形成自身的形态与风范。它以关东的土壤与血脉，繁衍嬗变着。与母体参照，既呈共相，又显殊容。如果说，以黄河为中华古代文化的摇篮，并在历时的积淀中构成中华民族的主体文化；那么，东北大地也久有先民的文化足迹。据1979年至1983年考古学家在辽西东山咀村对原始社会末期大型石砌祭坛遗址和牛河梁村女神庙及大冢群的发掘，认定“五千年前，这里存在着一个具有国家雏形的原始文明社会”。它的发现“将中华文明史提前了一千年”，真正复原了中华五千年文明古国的面貌；并且在中华文明的多元走向中，寻找到了东北文化的源头。“关东”的概念，在历史的衍化中，可能与山海关的建造（明·洪武十四年，1831年）不无关系的^②。但是，它的文化、文学流脉，却与自远古便与黄河为主体的中原文化同步发展着。其间多有交汇与同化，但又独领风骚。清入主中原后，曾把关东作为发遣罪犯的流放地，许多具有很高文化素质的文人，被流放到关东来。“南国佳人多塞北，中原名士半辽阳”的诗名，便是这种情景的折射。清达盛世，内地与关东更加形成文化交流频繁的趋势。于是，在并东的土地上，农业文化、草原文化和渔猎文化冲撞互济，混同发展。鸦片战争后，随着清政府的衰败，日俄的侵略势力，又插足东北。“马关条约”（1885）的

^① 参看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第12—1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② 李治亭：《关东文化论》，《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1期。

恶果，日本占据了辽东半岛；“中俄密约”（1896）、“旅大租地条约”（1898）后，沙俄在东北建筑起东清铁路，并且变旅顺、大连为租借地。日俄战争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为日本的殖民地，这使得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殖民地文化，在激烈的冲撞中构成一种复杂的态势。广袤的沃野，渔猎的生活，生成古朴、粗犷，豪爽的民族品格。《黑龙江外记》称其：“好耕植之余，勤于骑射弋猎，兼习礼让，务农敦本，而不逐末。”“临阵遇敌，奋不顾身。无问何部族，皆出性成。是惟在有司栽培诱掖，使之勤不为贪，刚不为乱，范围于义兼耻之中，以保全其果敢雄强之气，则有补于干城藩卫者大矣”^①。这部晚近代的杂记随笔，可以见出关东民风心态。当民族磨难压境，生命的危亡受到胁迫，慷慨悲歌的患难意识，雄强之气，就更为高扬。于是粗犷与豪健并存，质朴与坚毅同在，这反映到文学的神魄中，则凝为阳刚之气，浑厚而劲道。与江南之秀美、绵柔恰成比照。古人所谓：听“古曲使人神气鹰扬，毛发洒淅，足以作勇往之志”；听“南曲则行徐绵眇，流丽婉转，使人飘飘其所守而不自觉”^②，颇近两者的况味。如此，关东、岭南、荆楚、闽粤等地域文学，以其姿色韵味，不断地充实于中华的文化母体之中。

就现代文学的时空范畴来说，由于重压下曲折的发展，自然与母体之间造成一种断裂感。但即便如此，也和整体的中国现代文学呈现出影响或平行的发展趋向。即使像被称为“鬼才”的爵青的作品中，也会看到他对我国古代文学中的血缘关系，从诗人李白到赵子昂的文思都潜隐在他作品中。“五四”以后，东北的《大北新报》、《盛京时报》等报刊都一度成为传播革命文学的阵地。金人、任国桢、铁弦都是介绍苏俄文学有

① 《黑龙江外记》（二）第73—74页，商务印书馆1936年。

② 见周惠泉：《元明时期金代文学论略》，《晋阳学刊》1992年第1期。